



经济增长动力耦合与全球经济再平衡

陈继勇 周 琪

摘 要:以经常账户不平衡为纽带的失衡各方经济增长的动力耦合促成了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并增长”格局的形成。在金融危机余波尚存,重大制度或技术创新尚缺的条件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未改变全球经济失衡的本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实质是通过渐进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动力的重新耦合。这不仅需要经济失衡各方着力解决内部失衡问题,更需要注重经济增长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成本的合理分担。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经济再平衡;经济增长动力;耦合

一、全球经济“失衡并增长”的共存现象

21 世纪初,全球经济“失衡并增长”的共存现象已成为国际宏观经济环境最突出的特点,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经济失衡所表现出来的实物、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资源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非均衡流动反而极大地促进了各经济体经济强势增长,并持续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经常账户不平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之一。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大致始于 1996 年,除在 2001—2002 年和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有过短暂缓和外,经济失衡持续扩大(图 1)。2006 年全球经常账户不平衡总额(绝对值)甚至超过了世界 GDP 的 6%。在经济失衡愈演愈烈的同时,全球经济除在本世纪初因主要经济体增速缓慢而历经温和调整外,总体上呈现“高增长”态势。1996—2007 年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 3.98%,2007 年甚至高达 5.4%。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了世界经济连续 5 年的强劲增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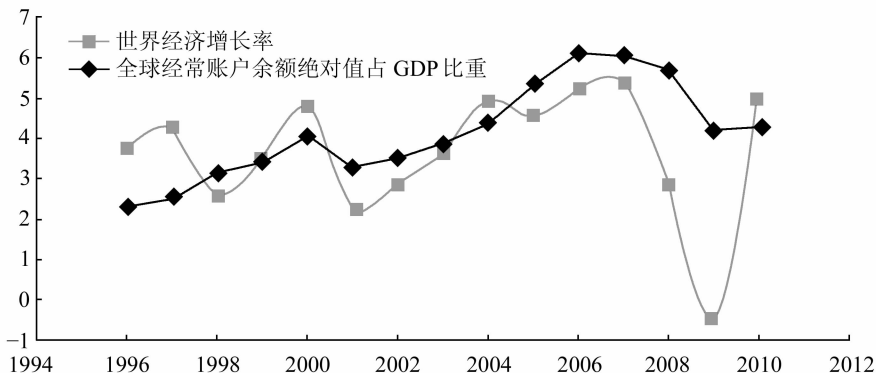


图 1 全球经济失衡程度与经济增长率变化(1996—2010 年)

数据说明: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提供了 184 个国家和地区的经常账户数据。但对于数据缺失的国家,笔者默认其经常账户处于平衡状态。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1》计算而来。

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制性地缩小全球经常账户不平衡规模。全球经济失衡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同时,受各国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世界经济开始稳步复苏,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均呈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

全球经济失衡不仅对各国经济造成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也给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和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提出的再平衡(rebalancing)能否真正实现全球经济平衡增长呢?全球经济“失衡并增长”的格局能否维持,抑或已然改变?这需要我们分析经济体增长动力以及它们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内在联系,并剖析经济再平衡的实质。

二、经济失衡各方经济增长动力耦合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格局渐进形成过程中,“经济失衡的本质随时间而变,在不同阶段不同的因素和参与者起着不同的作用”^①。如图2所示,自1996年以来,在经济失衡外在表现上,作为失衡最重要一方的美国其经常账户逆差扶摇直上,并牢牢占据全球经济失衡一极;但居失衡另一极的经常账户盈余方,诸如德国和日本、亚洲新兴经济体和石油输出国,其重要性并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分析不同阶段失衡主体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可以更好地厘清全球经济失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并借此判断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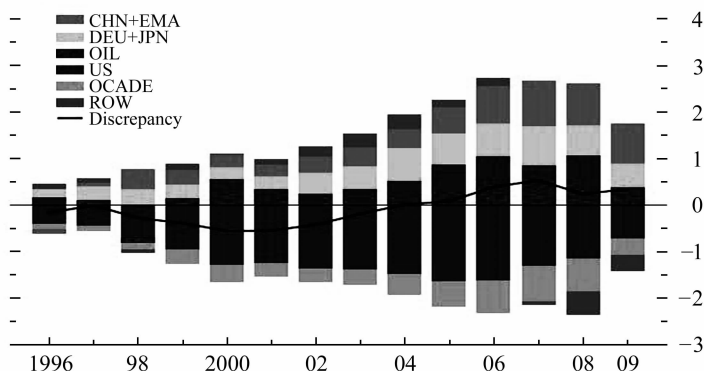


图2 1996年以来全球经常账户逆/顺差分布情况(占世界GDP比重)

说明:CHN+EMA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DEU+JPN是指德国和日本;OIL指石油输出国;OCADE指其它经常账户赤字经济体;ROW是世界其它经济体。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0.

(一) 失衡各方经济增长动力

1. 美国及其经济增长动力

1996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发生了显著变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减小,消费尤其是私人消费作用日益突出。与此同时,美国飞速发展的金融创新加速了金融膨胀,不仅使得金融资产在整个GDP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也减少了储蓄的积累,有力地刺激了消费进一步增长。

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产业的创新能力对经济的稳定增长作用巨大^②,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飞跃发展推动了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并一直持续到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这一时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旧突出。受益于网络经济的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强烈预期,以及同期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经济继续低迷,大量资本开始流入美国。短期资本的流入成为美国平衡国际收支的重要力量,这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并不突出,其占同期全球经常账户逆差的比重维持在1%左右。

长期以来,私人消费一直是美国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支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3(图3)。尤其是2003年以来布什政府时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加明显。2008年私人消费占实际GDP比

①Olivier Blanchard,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Global Imbalances: In Midstream? IMF, SPN/09/29, 2009, p. 7.

②陈继勇,胡艺:《知识经济时代与世界经济失衡问题的再认识》,载《世界经济》2007年第7期,第27页。

重达到了 71%。最近 20 年里,美国实际消费需求的增长率每年高达 3.5%,而实际可支配个人收入增长平均仅为 3.2%^①。美国过度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得以稳定运行,这得益于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和资本账户顺差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的发展得以持续。美国大量进口了来自东亚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廉价商品,降低了国内生活和生产成本,提高了本国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居民财富;而随着美国国内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大量国际资金流入美国,特别是来自石油输出国、东亚新兴经济体巨额贸易顺差所积累资金的回流,弥补了美国国内高消费和低储蓄的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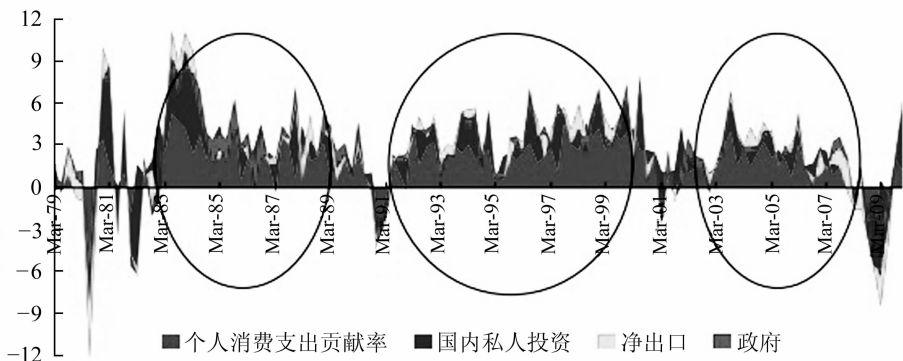


图 3 支出法中各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单位:%)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www.bea.gov。

2. 亚洲新兴经济体及其经济增长动力

亚洲新兴经济体扮演失衡盈余方并对全球经济失衡起到举足轻重作用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面对国内需求萎缩(中国的投资需求除外)和外部需求扩张(主要是美国需求扩张),出口成为亚洲经济体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表 1 列举了 2000—2008 年间亚洲主要经济体(除日本外)经济增长率及其受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影响程度。在此期间,亚洲(除日本)经济平均增速为 7.1%,远远高于全球平均 4.0%和欧美平均 2.5%的经济增长率。但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受到投资和出口驱动显著。亚洲 7.1%的增长率中,消费、投资和出口的百分点分别为 3.0%、2.5%和 1.6%,可见其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存在明显的依赖性。

然而,亚洲各经济体经济增长动力并不尽相同。中国、印度和越南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国家。中国年均 10.2%、印度年均 7.2%和越南年均 7.5%的经济增长中,投资分别占 5.0、3.6 和 4.3 个百分点。尽管中国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比重从 2000 年的 21%提高到 2008 年的 33%,但是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 1.1%。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净出口贡献 1.4~2.2 个百分点,显示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突出作用。

3. 石油输出国及其经济增长动力

2002 年以来,石油输出国经常账户盈余出现持续扩大,并成为全球经济失衡中一支重要力量。中东、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增长源泉主要来自油气资源输出,石油美元在经济中处于关键地位。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占其整个出口商品的近 90%,俄罗斯燃料类产品出口的比重由 2004 年的近 60% 上升到 2008 年的 73%^②。近年来,石油输出国经常账户盈余迅速膨胀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国际石油价格的持续飙升。尽管导致油价走高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是全球经济快速增长对石油的巨大需求进而推高国际油价的作用不容小觑。泛太平洋工业地区和欧洲是全球石油主要流入地,这些地区也正是全球经济失衡最重要的参与者。

①陈继勇、盛杨悻、周 琪:《解读美国金融危机——基于实体经济的视角》,载《经济评论》2009 年第 2 期,第 74 页。

②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表 1 2000—2008 年间亚洲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单位:%)

	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率组成部分				
		消费			投资	净出口
		总消费	私人消费	政府消费		
中国	10.2	4.1	2.8	1.3	5.0	1.1
印度	7.2	4.1	3.5	0.5	3.6	-0.3
越南	7.5	5.3	4.8	0.5	4.3	-2.4
印度尼西亚	5.2	3.1	2.5	0.6	1.0	1.4
韩国	4.9	2.5	1.9	0.6	1.0	1.4
马来西亚	5.1	4.6	3.5	1.1	0.4	0.1
新加坡	5.5	2.8	2.1	0.6	1.5	1.5
中国香港	5.0	2.3	2.1	0.2	1.3	1.7
中国台湾	3.6	1.5	1.4	0.1	0.0	2.2
亚洲平均	7.1	3.0	2.5	0.5	2.5	1.6

说明:由于舍入误差和统计口径等因素的存在,经济增长率组成部分加总后并不一定与经济增长率相同。

资料来源:EIU Country Data,IMF’s WEO。

(二) 以经常账户不平衡为纽带的经济增长动力耦合

无论是基于国际分工^①抑或比较优势^②的视角,还是论证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的“双循环”机制^③,都部分表明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与经济增长存在内在相互作用机制。尽管经济失衡本质上是一种由供求不平衡而造成的市场无法出清状态^④,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各国外部经济的失衡促使供求关系(至少包括实物和资本两种供求关系)通过经常账户不平衡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平衡,并自发成为市场选择的结果。全球经济似乎陷入了处于失衡一极的美国与失衡另一极的亚洲经济体和石油输出国等相互依赖的共生增长模式^⑤。

它表现为两方面的平衡。一方面是资源在消费过度的美国与出口导向的亚洲经济体和石油输出国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是在美元居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吸引大量资本流入和亚洲经济体与石油输出国积累大量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

全球经济失衡各方经济增长动力的耦合,以各方经常账户不平衡为纽带,促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这种配置通过三条渠道得以实现。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贸易盈余方融合自身人力资源和俄罗斯、中东地区、巴西、澳大利亚等经济体的石油、铁矿石等资源产品,形成以中国、东盟等亚洲新兴经济体为主体的低端制造业产品链和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为主体的高端制造业产品链。在全球范围内专业化的分工生产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产品生产成本,更多的产品也不仅仅是流入美国,而是涌入世界各地,极大地满足了各国消费需求,并刺激各国经济呈现“高增长与低通胀”的最佳状态。二是金融急剧膨胀的美国、英国等多样化金融产品满足了全球范围内巨额流动资本的需求。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贸易盈余方迅速扩张的资本积累转化对上述地区的融资或借贷,支撑美国等庞大的消费需求,并拉动全球生产的扩张。三是拥有绝大多数的跨国公司、高科技产业的发达经济体凭借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在全球,尤其是在新兴经济市场攫取实业资本利润,并成为其国内消费的重要推动力量。

经济增长动力的耦合不仅促进了全球经济在过去十年里快速增长,也极大提高了全球生产能力,拓宽了全球市场容量。根据世界银行 2009 年估计(World bank,2009),在 1999—2008 年这十年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 3.5%,国际贸易的年增长率达到 7%,国际资本流动的年增长率更是高达 14%^⑥。

①徐建炜、姚 洋:《国际分工新形态、金融市场发展与全球失衡》,载《世界经济》2010 年第 1 期,第 3 页。
②张幼文:《要素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历史影响》,载《国际经济评论》2006 年第 2 期,第 43~45 页。
③李向阳:《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载《国际经济评论》2006 年第 2 期,第 19~21 页。
④华 民:《世界经济失衡:概念、成因与中国的选择》,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第 6 页。
⑤赵夫增:《经常账户失衡格局下世界经济共生模式》,载《世界经济研究》2006 年第 3 期,第 13 页。需要说明的是,赵夫增只解释了美国和亚洲经济体之间的共生模式。实际上,在资源对经济增长限制作用日益突出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考虑石油输出国对经济失衡的影响。
⑥数据来源:World Bank。

三、全球经济再平衡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要求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实现经济再平衡的呼声日益高涨。推进“全球经济再平衡”已成为世界性议题,并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全球经济调整的主旋律。IMF早在2010年10月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就明确指出,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的主要任务是促进经济复苏、防范风险和再平衡(Recovery, Risk, and Rebalancing)。美国顺势在匹兹堡 G20 峰会上提出全球经济平衡增长(balanced global growth)命题,试图“启用规定政策和方法的行动框架,创建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①。然而,在当前 IMF、G20 等国际经济组织和协调机制依然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背景下,这一貌似为全球经济描绘均衡增长蓝图的框架协议能否为各国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并在调整全球经济失衡过程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值得质疑的。

(一) 全球经济失衡本质并未改变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全球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各方储蓄与投资结构、以及国际金融体系都已发生重大变化,失衡各方顺差或逆差规模也有所收窄,但全球经济“失衡与增长”格局依然存在。失衡的调整只是金融市场的去杠杆化,出口产业的去产能化和商品市场的去库存化。经济增长不仅是各国刺激经济复苏政策干预的结果,而且是对全球利益分配差异的暂时纠偏,但并未改变全球经济失衡的本质。这主要是失衡各方经济增长动力耦合难以改变。短期内,各经济体缓慢调整必将继续维持经济增长动力的耦合机制,全球经济失衡不会导致大的变革。

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结构巨大而深刻变化的结果。更多的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并充分发挥自身要素的比较优势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尽管这种红利扩散的利益分配对南北国家而言并不均衡。以经常账户不平衡为纽带,通过失衡各方经济增长动力耦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初级产品—半成品—成品—消费国的多次跨境、高度关联的生产贸易一体化链条”^②是一种脆弱的动态平衡,任何一个环节的改变将导致全球经济面临巨大风险。更为严重的是,长期倚重外向经济使得各国内部经济结构面临诸多问题。美国等欧美国家“去工业化”所导致的内部实体经济萎缩,外向型新兴经济体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依赖所导致产业结构同质化以及自身消费能力不足等。诸如西欧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发展中经济体金融深化的扭曲等各经济体发展中长期积累的问题所导致的内部失衡将成为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最大障碍。

与此同时,缺乏创新基础的全球经济脆弱复苏不会改变现存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历史经验表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必须建立在制度创新或技术创新的基础上。然而,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仍然处于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之中,网络信息技术溢出效应依旧明显。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生产力产生巨大变革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包括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和新能源的技术革命等已经出现^③。

(二) 经济再平衡的实质是经济增长动力的重新耦合

现有的全球经济非均衡增长模式已积累了诸多矛盾和不均衡现象。因此,全球经济再平衡需要各方重新审视经济发展动力内在的耦合机制,渐进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序调整自身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并实现内外经济平衡。

首先,全球经济再平衡要着力解决各经济体的内部失衡。

尽管全球经济失衡格局的形成各方都难辞其咎,但追求经济发展,提高国内居民福利水平无可厚非。因此,外部经济失衡调整的动力将来源于对内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与内部失衡的纠偏。失衡最重要一方的美国不仅仅是“增加储蓄和节约开支,以降低长期赤字”和加强金融监管^④,更为有效的方法将

①资料来源: http://www.whitehouse.gov/files/documents/g20/Framework_Fact_Sheet_Pittsburgh.pdf。

②王子先、赵青松、何亚东:《从全球化视野对世界经济失衡问题的再认识》,载《国际贸易》2009年第12期,第4页。

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中国经济的外部影响因素》,载《光明日报》2010年3月30日第10版。

④Barack Obama. “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t Suntory Hall”.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suntory-hall>.

是放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①,这不仅有利于缓解美国当前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促进经常账户的平衡,同时将对全球技术创新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②,并助力全球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出现。而对于失衡盈余方如何增加国内需求将是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点。这也有利于各国,尤其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具体而言包括中国、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消费需求,日本私人部门投资需求和石油输出国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需求的多元化是经济增长动力重新耦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中重建更加均衡全球经济需求结构将显著削弱以单一国家作为世界主要净需求方所产生的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与脆弱性。

其次,经济再平衡需要注重经济增长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成本的合理分担。

全球经济再平衡必然伴随各主要经济体力量对比的消长。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逐步企稳和全球经济的复苏,全球失衡格局正在发生着积极变化,而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再平衡已经开始稳步推进。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运行的影响力有所下降,而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尽管全球可能出现的“多级增长”将有助于实现平衡、全面的增长^③,但是经济增长的利益在南北国家如何分配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动力的重新耦合程度,也关系到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程度。与此同时,诸如全球利率的调节,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和全球性通货膨胀等因素不仅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果在禀赋各异,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体之间重新非均衡的分配,而且使得经济再平衡的调整成本极易在国际间转移,从而使得利益分配在已然不均的南北经济体出现“成本倒挂”的格局。因此,经济再平衡不应成为美国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华丽外衣,更不应由发展中经济体承担主要调整成本。

最后,全球经济再平衡将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全球经济失衡暴露了当前世界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调整经济失衡势在必行。然而,在金融危机余波尚存,重大制度或技术创新尚缺的条件下,全球经济再平衡并非易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美国只消费不储蓄的习惯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其庞大的财政赤字削减问题不仅正困扰美国自身,而且对全球经济体已产生深远影响。尽管美国提出了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形态,但目前来看其发展前景甚不明朗。欧洲仍未见底的债务危机扩大蔓延的趋势日益显现,欧元区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而尽管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着手调整经济结构,但是经济增长模式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主导型的转变难以在短期内完成,经济或将经历外需停滞不前而内需尚未培育成熟的转型阵痛。因此,全球经济再平衡需要各方循序渐进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并促使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耦合,使得南北国家更加均等的享受经济全球化的红利。

■作者简介:陈继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周 琪,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008);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2010年委托项目(27515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1YJA790087);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2011年度一般项目(20110350);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2009年度项目(20081050102000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7AJL016);武汉大学2010年通识课程建设项目(TS201010)

■责任编辑:于华东

①陈继勇,周 琪:《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失衡问题研究》,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20~22页。

②胡 艺,陈继勇:《基于新评价标准的中美经济增长质量比较》,载《经济管理》2010年第2期,第17页。

③R. B. Zoellick. "After the Crisis", Speech at the Paul H.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Washington, 2009.